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玉门油矿 勘探开发初期的贡献

合 岩 永 生

玉门油矿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勘探开发的。她的产品有力地支援了我国的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油矿生产发展很快,迅速建设成为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为石油工业的大发展,发挥了“三大四出”(大学校、大试验田、大研究所;出经验,出人材、出技术、出产品)的作用。

玉门石油资源的勘探与开发,从前清到民国,曾有过几次筹划,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第一次是在清光绪年间,聘请洋员林辅臣办矿¹⁾。林辅臣系比利时人,曾对玉门石油进行过调查,并携带油样到上海化验,证明油质甚佳,愿意自备工本开办。1905年,甘肃省洋务总局决定,经陕甘总督升允批准,设立甘肃制造油烛糖酒公司,聘用林辅臣为公司总办,开办玉门石油。同年9月15日,甘肃矿务局与林辅臣签订合同,随即派林回比国购机雇匠,预先发给三个月薪水银九百两,又川资银二千两。次年秋,林辅臣死于途中,其次子比利时参赞林阿德来甘接办其事。林阿德到甘肃不久,“又考得皋兰县之凤凰山有铜矿……又采得西宁之麻矾雪山金苗极旺”,于是提出开办铜矿和金矿的主张。官方见异思迁,赞许开采金、铜,认为“此将来矿务之确有把握者也”²⁾。而对于石油,升允在给清廷的奏摺中却说:“其玉门石油。质亦甚美,惟距省太远,运销不便,俟有余力再行开办。”因而开办玉门石油的事,就此搁置。

第二次是张人鉴计划开矿。1928年,地质家张人鉴奉甘肃省政府之命,到玉门调查石油,他亲自取油样作蒸馏试验,认为油质甚好,颇有开采价值,遂拟订一个开发玉门石油的详细计划。他主张:玉门石油矿应收归省有,商民不得私自经营;组织力量进行钻探,如钻探机器购买不及,可向外省借用;矿量确定后,即开凿油井采油;建设炼油厂,提炼最需要之汽油、煤油,使之成为开发西北富源的基础。他建议筹办的炼油厂,如财力不足,可与新、陕、青各省合办,并认为“借款办矿,各国已有先例,与外人合办矿业,条件合理,不为丧权辱国,亦未尝不可。”这个计划送到甘肃省政府后,如石沉大海,无人理会,开发玉门油矿的设想,变成一纸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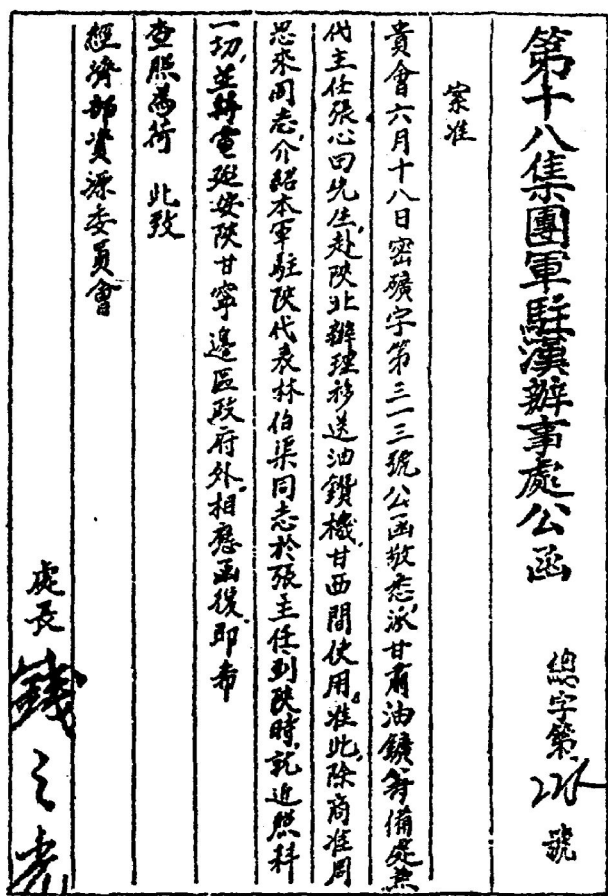
第三次是顾少川等人准备开矿。1935年7月12日,顾少川(即顾维钧)、周作民等五人呈文国民政府实业部,请求特许专探专采甘肃、新疆、青海三省石油。此项请求,由行政院组织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五个部,会同经济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审查讨论,结果确定了八条特许原则,限期在呈请特许案核准后六个月内,必须开始勘探。11月1日,国民政府发布第八十二号训令:“此种矿业依总理遗教应归国营,惟目前国库竭蹶,无力经营,与其弃置,似不如利用人民财力提早开采。”1936年2月,实业部发给特许证,并通知有关省、县政府,取缔玉门石油河一带的土法开采。这一年,顾少川等在上海成立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聘请中外技术人员,于1937年,对青海柴达木和玉门石油河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在这期间,他们虽然把玉门石油作为调查重点,但却没有勘探开发的实际行动。1938年夏,资源委员会以申请人未能按规定期限如期开发为由,由经济部出面收回特许权。

1) 见甘肃洋务局与林辅臣所订合同第二条。

2) 见陕甘总督升允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给清廷奏摺。

1938年,我国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基本断绝了“洋油”的来路,抗日后方出现严重的“油荒”。当时在武汉的国民政府,不得不临渴掘井,被迫决定开发玉门石油。乃由资源委员会建立甘肃油矿筹备处,着手进行石油勘探。这一历史事实,在中国石油公司年报中曾有追述:“抗战军兴,海口均遭封锁,外油来源断绝,本会为适应战时需要,乃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钻探甘肃玉门老君庙油田。”(见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三十五、三十六两年年报》)。

玉门油矿勘探开发初期,首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支持。钻探玉门油田最早使用的两台钻机,是经过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同意,从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属的延长油矿调给的,钻井工人也是从延长油矿去的。当时甘肃油矿筹备处使用这两台钻机钻了六口浅井,井井出油,从而证明了玉门油田具有大规模的开采价值。应该说,这是国共两党在第二次合作期间的一个可喜成果。



1938年6月18日,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发出密矿字第三一三号公函,送交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公函说:本会奉令勘探甘肃油田,需用油钻机,拟从陕北延长、永坪选配两部连同锅炉等件运往甘肃,兹派本会甘肃油矿筹备处兼代主任张心田前往商洽。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接到公函后,即时征得周恩来同志的同意,于二十日复函资源委员会:“除商准周恩来同志,介绍本军驻陕代表林伯渠同志,于张主任到陕时,就近照料一切,并转电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见第十八集团军公函,左图)。张心田随即经西安转赴延安。

张心田到了延安,高自立(即高岗)、肖劲光会见了,边区政府第三局王局长和八路军后勤部军工局李强副局长同他进行了协商,慨然同意予以拆迁钻机,并表示给予工作上的支持。7月20日,张心田给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副主任钱昌照电报说:“移用陕北钻机事,因到延安后承八路军留守处及边区

政府赞助,已与工业局负责人商洽妥当,留一部钻机在永坪继续钻探,以两部钻机交职处运甘肃用。田拟于日内返西安,俾早调派员工办理拆运事宜。”张心田回到西安,为了表达他在延安承蒙照顾的感激之情,于8月10日给高自立、肖劲光写信说:“上次陕北之行,获觐鸿宇,备承优待,感常谒晚。”

1938年8月下旬,资源委员会派出拆运钻机的工程师赵润型等15人到达陕北。在拆迁过程中,陕甘宁边区政府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钻机、钻具、锅炉和配件,一一配备齐全。当一切准备停当,等待起运,而国民政府却无法派出车辆,张心田又致电李强,请求派车运送,八路军总部曾多次派出汽车,将全套机器配件,悉数运到咸阳。在装运中,由于钻机不靠公路,陕甘宁边区政府便动员群众把钻机搬到公路边装车,保证了运输工作的顺利进行。但是,当钻机运抵咸阳后,国民政府仍无车接运。10月28日,张心田给翁文灏、钱昌照的电报说:“陕北机件,经商租八路军汽车十三辆完全运出到咸阳,公路局无车接运,拟雇大车及自备汽车续运兰州。”

1938年12月23日,正值岁暮天寒,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采油工程师严爽,偕同地质学家孙健初和靳锡庚等人,携带蒙古包及干粮、测量仪器等,骑骆驼从酒泉出发,三天抵达石油河矿区,在老君庙旁搭起蒙古包,扎下营地,开始了油苗探查、地形测量和地质调查。1939年春,陕北拆迁的钻机陆续运到矿区。两台钻机均系冲击钻(即顿钻),原动力为25马力,可以钻200米深的井。延长油矿调来的钻井工人杨邦福、徐成华、郑云兴、郑云祥等,及锻工、木工十余人也先后到矿。玉门油田开始了勘探开发的新时期。

陕北拆迁的第一台钻机安装在一号井上,于1939年5月6日开钻,8月21日钻至115.51米,遇到“K”油层,完井投产,日喷原油10吨左右,这在当时可说是一口高产井,使在矿员工大受鼓舞。第二台钻机安装在二号井上,8月17日开钻,9月15日钻到145.88米见油,日产12吨左右。据《甘肃油矿创办三年经过概况》记载:“从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〇年八月,凿成浅井三口,出产原油三十二万七千一百余加仑,炼成汽油五万一千二百余加仑,灯油一万九千七百余加仑,柴油三万九千二百余加仑。”这一成果,成为1940年9月钱昌照、孙越崎等到矿视察,决定扩大开发玉门油田的一个重要依据。

从陕北拆迁钻机勘探开发玉门油田,其意义和作用,翁文波教授曾撰文写道:“这件事,1962年2月周总理在大庆接见石油工作者时,还追述了亲自批准调派钻井队的过程,就是那些井队打出了玉门油田的发现井。这个油田不但为抗日增添了一分力量,而且也成为世界地质史上一个非海相油田的重要先例。这一非海相生油观点为全国解放后大庆油田的发现拔除了理论障碍。”(载《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4期)

钱昌照从玉门回到重庆,拟具了一个大规模开发玉门油矿的计划,准备从美国购进钻机14台(旋转钻12台、顿钻两台,能力均能钻到800—1000公尺)、日炼原油7万加仑的炼油设备一套、抽油机40架、发电机5部及储油输油等全部设备。1940年冬,资源委员会派工程师张心田、肖之谦前往美国,遍历各大油田,于1941年3月把计划购置的设备全部购妥。但是,这一扩大开发计划,遭到了国民政府某些人的反对,延误并阻碍了油矿的发展。钱昌照以亲身体会,详细叙述了这一历史事实。他写道:“一九四〇年我和孙越崎、霍宝树等到了玉门油矿,我要他们根据实际情况,拟一初步开发计划。他们拟好了,但是很颓丧地说:‘需要一亿二千万国币,五百万美元,恐怕政府不答应。’我说:‘此事由我负责’。回到重庆,蒋介石同意了,孔祥熙起来反对,叫蒋廷黻在国民政府行政会议上,提出招商承办的主张,并且通过了决议,这等于说不办。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上,又把计划提出来,气愤地说:‘中国如果是个上轨道的国家,抗战以前,这样的矿早就应该开发了。时至今日,再不开发,太不象样子。’当时除财政部代表外,大家都赞成我的意见,结果取消了行政院的决议。就由于这一纠葛耽误了两个半月,接着珍珠港事件爆发,三分之一的机器运到仰光被炸,其余的在旧金山运不出来。要不是孔祥熙从中作梗,全部机器可以运到玉门,产油炼油就能顺利进行。”(见“地质家翁文灏”,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

从玉门油矿勘探开发的过程中,不难设想,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积极努力和支持,玉门油矿的开发建设,仍有可能重蹈历史上“三起三落”终归失败的覆辙。

(收稿日期 1984年10月31日)